蒋介石陪都抗战二三事

周 显 荣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原拟把最高统帅部迁往湖南长沙，未料11月12日夜间，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早已接受命令准备实行“焦土政策”的士兵以为是约定的点火信号，便在市内各重要设施一齐纵火，一夜之间长沙市区烧毁三分之二。16日蒋介石从南岳到长沙视察火灾情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满目疮痍。为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放火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黄埔一期学员、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交军事法庭审判、处以死刑。

12月 8 日，蒋介石于南岳军事会议后由桂林飞抵重庆，开始了大约七年的陪都抗战，直到1946年 4 月30 日，飞离重庆去南京。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9年 9月1 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与之呼应，日本于 9 月初设立“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企图尽早解决中日战争而挑起决战， 日军选择的首攻目标是长沙。 9月中旬，集结在南昌地区的日军10万人在飞机掩护下，西向进击威逼浏阳，湘北日军由通城、岳阳、营田三路南下。日军别动队于 9 月底在海军支持下，由洞庭湖溯湘江、浏阳河一举推进到长沙附近的永安、桥头等地。蒋介石利用早已建立好的情报组织，准确及时地获悉日军的进攻计划，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电示：“ 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与其致命打击之反攻。’第九战区20万中国精锐部队在修水附近迎击西进日军，展开殊死大激战，并逐步诱敌深入长沙附近。中国军队于10月 2 日展开总反攻，给日军以重创。第一次长沙作战将敌第十三、第六、第三师团击溃，使其伤亡 4 万余人。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中国腹地，首次遭此大败，大大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1941年 9月17 日，日军在充分准备后，调集第三、第四、第六和第四十四师团12万军队，顺岳阳南新墙河一线向长沙发动进攻，在海、空军支援下，于 9月25日、 9月28日先后两次突入长沙城内，第九战区中国守军进行了逐次抵抗后，将主力迂回至敌军侧翼。待反攻准备就绪，蒋介石于 9月26日致电陈诚、李宗仁、顾祝同、薛岳：“ 命令：兹规定各战区按照有日加强部署电令，开始攻击时间如下：（一）第三战区于俭日开始攻击。（二）第五战区于感日开始攻击。（三）第六战区于卅日开始攻击。 ”遭受强大反攻的日军被迫于10月1 日开始从长沙撤退。第二次长沙作战日军共死伤一万余人，但中国军队死伤五万八千多人。 10月16日在南岳第三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对日军以少数兵力突破我军六个师之正面，并于28 日攻占长沙一事大发雷霆、捶桌顿足，训责“ 有的部队打一天二天就下来了，怡然不知羞耻，武德堕地莫此为

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南方作战，日军以占领广州的第二十三军进攻香港，同时决定由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发动第三次长沙作战，以牵制第四战区的中国军队，减轻广州日军压力，并伺机占领长沙，打通粤汉铁路。

中国军队于11月初便订出“在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反击而歼灭之”的战略，并将战略预备队迅速增至八个军（20个师兵力）。日军于12月23日从新墙河发起攻击，27日抵汨罗江，中国军队且战且退。其时，日军第二十三军已于25日攻陷香港，无须再对中国军队作牵制作战，但日军第十一军军长阿南唯几中将判断中国军队正在溃逃，决心一鼓作气攻下长沙，31日进至长沙北面金井、三姐桥一线。时刻关注长沙战局的蒋介石判定敌人正在一意向长沙推进后，于12月30日给第九战区司令官指示：“第九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止敌人以一部向长沙率制，先以主力强迫我预备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预备兵团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进攻长沙，待其攻势顿挫，举各方全力向敌围攻，以主动地位把握战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按蒋介石之命令，以一部分兵力防守长沙，以四个军在正面节节抵抗，同时急调七个军的兵力于浏阳河、捞刀河一带。1942年1月1日，日军以第四十师团、第三师团冒险猛攻长沙城。我担任长沙城防的精锐部队——第十军沉着应战、拼死抵抗，屡挫敌之攻势。蒋介石于1月2日致电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并转全体官兵；“我第十军官兵，两日来坚守阵地，奋勇歼敌、致堪嘉慰。……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1月1日晚12时，我控制于浏阳河以南的预备队和原先撤向两侧的部队一齐向长沙作向心攻击。战至4日，日军在长沙附近已被中国军队三面包围，才仓促突围，途中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和围歼，日军第三师

团和第六师团损失惨重，如果不是日军飞机的掩护和第十四旅团的策应，进攻长沙的两个师团将被全歼。日军残部 1月15 日才勉强退回新墙河北岸原来的阵地。

在重庆的蒋介石，一直在遥控着第三次长沙作战。从1941年12月17 日至1942年 1月26日，蒋介石与各战区、各集团军司令官往来的重要电报达47封之多。在总体战略方针下，随机调整军事部署和行动时间。 1月22 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和被俘达五万七千余人。

第三次长沙大捷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盟军获得的首次重大胜利。中央社纽约 1月5 日专电称"：中国长沙大捷颇使此间人士欢欣鼓舞，是自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以来同盟国在远东的一大胜利。"蒋介石也写道："当此反侵略各国战争初期失利之时，我们在长沙方面能获得如此空前的胜利，不仅可以告慰全国民众，而且可以告慰世界友邦。"

大轰炸中视察灾区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兵力不敷,被迫放弃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大本营决心利用空中优势，命令对中国内地实施战略轰炸，以此来"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主要目标瞄准当时作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重庆。

1938年 2月18日，日机对重庆开始了首次轰炸，直到1941年9月10日，日机轰炸重庆给重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20000多名无辜百姓死亡丧残，数万间房屋和亿万资财毁于一旦，美丽的山城被炸得满目疮痍，血迹斑斑。

1939年 5月3、4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共出动63架飞机，对重庆市中区进行狂轰滥炸，共投弹292枚，并丧心病狂地投下近116

枚燃烧弹，全市连续不断地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投弹区鳞次栉比的木房瞬间化为灰烬。2日内被毁房屋2000余幢，死2648人，伤3668人。损失惨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震动了国民党最高层人物。蒋介石、宋美龄于5月4日晚和5日晨，两次亲临灾区视察，安抚人心并立即命令征集全市所有公私卡车、客车紧急疏散市民。这些车辆于5月11时集合后开始运送难民，其中有蒋介石委员长和林森主席的专车，市民无不为之感动。在以后三天的紧急疏散中，有25万市民被动员出城下乡。蒋介石当即还委派何应钦负责救灾，赈济委员会拨款100万元，急赈遇难同胞。同时，将重庆防空指挥部扩大为重庆防空司令部，派贺国光兼任司令，急调三个团的兵力归属防空司令部指挥。

1941年6月5日晚上，三批日机20余架在市区上空盘旋轰炸达三个多小时，空袭警报长达五个小时尖叫不停。由于准备不足，加之傍晚进城人多，警报拉响后仓促涌入大隧道内。较场口隧道内避难人数超过容量一倍以上，通风设备不好未能启用，人多时间长，气闷难忍，混乱中人们挤向洞口，而防护人员又将洞门紧锁，最后造成1115人窒息死亡，813人受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

蒋介石闻讯后立即于6月6日下午亲临现场视察，并慰问死伤者之家属。6月7日下手令：“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仍责成各该员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护设备，以观后效，此令。”7月2日，隧道窒息惨案审查会提出报告后，蒋介石还专门发通电希望“我民众与青年，踊跃参加空袭服务，群策群力，同赴事功，期补前失而宏后效，实所切盼。”

争取外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向国际舆论呼吁“必须认清和平是不可分的，孤立是不可能的，直至日本停止侵略为止，远东决无和平可言，世界和平亦无保障。”请求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当时，美英西方列强对此置之不理，而给中国以抗战援助的竟然只有苏联。南京失陷后不久，苏联派遣了 120 名飞行员及 4个战斗机、2个轰炸机联队支援中国军队作战，到1939年春，总共有 500多名苏联顾问和2000多名志愿航空人员参加抗日作战。从芦沟桥事变到1940年，苏联先后给中国贷款4.5亿美元，绝大部份是飞机、大炮、坦克及军需用品。

1938 年 9 月17 日，蒋介石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其著名的学者身份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促使中美关系日趋亲密。同时，让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赴美洽谈借款事宜。陈光甫拟用中国特产桐油作担保向美国贷款 2000万美元，适因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美国方面对贷款一事表现出犹豫不决。 10月31 日，蒋介石发表《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同胞书》，并指示胡适将其译成英文立即送交罗斯福总统，让美国方面了解中国“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略总方针后，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抗战“深表敬佩与同情”，终于12月15 日,增额为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得到批准。1939年 3 月 15日，英国也向中国贷款 50万英镑，用以购买卡车维持滇缅公路的运输。

1940年 6 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以他“私人代表”的身份去美活动贷款。宋子文到美国上下四处游说，在重庆与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直到 9 月，日军占领越南北部，美国深感不安才同意进出口银行给中国3500万美元的借款。11月 5 日，罗斯福三连任当选为美国第 34届总统，蒋介石立即致电祝贺。几天后，蒋介石分别接见美国和英国大使，当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积极争取美英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 12月 2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一亿美元贷款的议案，随后英国政府又同意给蒋介石

政府贷款1000万英镑。

1941年2月7日，罗斯福总统派白宫行政助理居里到重庆考察中国军事、经济状况。居里在中国呆了三周，其间蒋介石和他会谈10次以上，内容包括建设轰炸机基地、管理滇缅公路、接受美援武器等。居里回国后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访华报告，正值美国国会通过了《军火租借法案》,罗斯福在3月15日发表的演说中重申：“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3月31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点援助要求：美国为中国建立一支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称‘业已批准4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铁路、交通器材、卡车、兵工器材等。’8月1日，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成立、并于12月对日军采取军事行动。

1941年12月7日，日军机动部队突然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全世界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别墅接到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电话后，方知日军已袭击珍珠港，立即赶下山来，又不断接到香港、菲律宾、马来半岛遭日军空袭的电报，8日上午，蒋介石十分兴奋地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特别会议。决定中国向轴心国宣战，并建议由美国领导成立中、英、美、苏、荷、澳等国军事同盟。12月23日，蒋介石亲自在重庆蒋氏官邸主持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同时，蒋介石指令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26个国家联合宣言上签名、参加反对德、意、日的共同作战，并声明决不与敌人单独媾和。1942年1月3日，联合国决定单独开辟中国战区，由在重庆的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将军出任战区统帅部参谋长，肩负中国及泰国、越南、缅甸北部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2月21日，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信用贷款合约，美国给中国贷款5亿美元。5月2日,英国政府也同意给中国贷款5000万英镑。6月、宋子文又与国务卿赫尔

签订8.7亿美元的中美租借物资协定。

1943年10月28日，蒋介石意外地收到美国总统的电报，邀请他去埃及亚历山大港与罗斯福、邱吉尔会晤。 11月21日，蒋介石偕夫人乘飞机到达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于11月23日上午11时正式开幕。在与邱吉尔双边会谈中，蒋介石提出当时极为重要的在缅甸对日作战问题，提出中国军队从北面进攻，英国海军从南缅登陆夹击在缅日军，以保证英属印度的安全，同时打通滇缅公路，使美国援华物资能顺利到达中国西南。但由于“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只想中国军队单独承担义务，邱吉尔不答应参加作战。11月23日晚，蒋介石在与罗斯福密谈中再次提出缅甸协同作战问题，终于使罗斯福口头上保证美英出动海军配合中国军队作战。1944年10月，由盟军发动了收复缅甸的战役。

1945年 8 月15日上午10时，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一小时，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战区联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亲自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发表了广播演说，他宣布：“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蒋介石激昂的兴奋的语调，充分表达了他对抗战胜利的自豪和喜悦。

林森在战时重庆

席松军　王志昆

林森(1867～1943)字子超，家谱名长仁，号天波，晚年淡泊人生风雨,别署‘青芝老人”。

林森早年从事国民革命，对革命忠贞不二，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出于种种考虑，推举他为国民政府主席，主持中枢工作。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中国被迫开始了艰苦的全面抗战。鉴于当时战争的局势，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西迁重庆(后定为陪都)。作为国家元首的林森在10月30随中枢先一步前往重庆，那年他已70岁，不知能否坚持到抗战胜利，于是留下遗嘱，对自己的财物作了处理，并恳切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直到胜利降临华夏大地。蒋介石对林森非常敬重，亲率当时尚在南京的全部要员到码头送行，并即兴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迁

都后，要秉承林主席的教导，在艰苦中求革新，求精进，共同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枢到达重庆后，林森即领导各级机关迅速恢复办公，发挥战时效率，感召海内外同胞，团结一致，对日作战，百折不挠，为“最后胜利”奠定基础。林森还时常代表政府亲往军队慰问，以他的威望给广大士兵以鼓励，帮助士兵们树立必胜的自信心。不久，政府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也先后到达重庆，开始正常转运后，林森自觉执行国民党1931年12月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即根据政府的重心由主席移至行政院院长，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责任，成为一个“虚位”的规定，不再全面负责工作，不管的事决不去管，不该问的事决不过问。曾经有这么一件事：陈嘉庚是有名的华侨，在福建从事商务活动时，对当时省主席陈仪有些看法，并知道林森也看不惯陈仪的专断和片面，就专程到重庆拜会林森，希望他能出面调任陈仪。林森婉拒了陈嘉庚的要求，强调自己已居“虚位”不便过多干预政事。陈嘉庚很理解林森，也没再提此事。

半退下来的林森生活仍很有规律，每天黎明起床，盥洗完毕，阅看报纸，略进早食后步行片刻，然后去政府办公。午饍后，假寝须臾，便亲笔书答亲友故旧函件，再赴政府办公，接见僚属及宾客。偶也作画，随兴所至，兰竹尤为喜爱，但不轻示人。在待人接物上十分诚恳平和，向无疾言厉色，是一位蔼然长者。他虽为国家元首，但从无一国之主的架子，他时常微服出访，走了重庆大大小小许多地方。他外出时一般不带随从，喜欢与市民交谈，无所不问；也喜欢与商人接近，了解商人心理，传达政府的关怀。事后一些人才知道与自己交谈的竟是国府林主席。当时的重庆市民常能见一位身着蓝布大褂，宽额红脸，长髯飞扬的老人飘然过市，很有气度，也很风采。林森也爱到乡间散步，散步久了，认识了许多乡民，常与他们拉家常，询问生活状况及生活情形，

乡民们也乐于与他交谈。有时在散步途中遇有一些他认识的小孩，他总是笑眯眯向小孩们问长问短，有些年幼的小孩还会耍弄他浓浓的胡子，他一丝不恼仍旧笑容满面，乐在其中。有一次，林森在南泉特备的浴室外种花，花开得很繁，草也长得不少，他忽来兴致，想自己锄草，但手边没有锄草的工具，他就一人跑到邻近人家去取。主人正在屋里忙得不可开交，也未看清来人是谁，在屋里随便答了一句用具藏放的地点，待林森走时，还补了一句：“用了就还来”。到林森去还东西时，用具的主人才知是林主席，主人家大感不妥，心中不安，但他笑笑，非常客气地说了声“谢谢”。

贯穿林森一生的“嗜好”就是游历名山大川。由于政务繁忙，难以满足心愿。居于“虚位”使他如愿以偿。刚到重庆，他被安排在市区居住，但他很不喜欢市区的繁杂喧闹，便搬到李子坝刘湘的私邸。这房子中西合璧结构，相当高大，树林森然，极为幽静。嘉陵江流绕其下，人在屋中，如在画中，林森感到很满意。后因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为安全起见，又迁往重庆郊区歌乐山云顶寺。这云顶寺独踞歌乐山顶峰，风景幽美，气候宜人，常有云雾缭绕，地颇清静，人居于此，有世外桃园之感。深得林森喜爱。林森居住此地，除玩古董和读书外，雅爱种花，花种多系名品，春天来临，百花争艳，他便把园门打开，任人观赏，把春意传达给来此观赏的每一个人。蒋介石来重庆，在歌乐山双河街公路旁修建了一座官邸。官邸落成时，林森与国民党的要员前往祝贺，见这里风光秀美，于繁华中见幽静，便忍不住大加赞叹，蒋介石马上指定此官邸由林森居住,人们便称这座官邸为‘林园’。除‘林园’外，林森在南温泉尚有一座别墅。南温泉是重庆著名的风景区，山清水秀，建文峰林涛如海，花溪河烟朦水迷。是休养的好去处。蒋介石知道林森的性情，让孔祥熙在南温泉为林森修建别墅。新建成的别墅背倚建文峰，门对虎啸口，青石小桥，隐约林间。春秋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林森常到别墅听山间虎啸，清泉声潺：看溪上小舟、建文落日。丰神淡远，倒为青山增色不少。

林森在政治上追求无为，待人接物平和有礼，但他为人端正严谨，待己十分苛刻。政治上的“虚位”并未减少他什么工作，每天有许许多多琐碎杂务要他处理，光是来的函件择其要者都非常多。本来政府派一秘书协助工作，但他婉拒了。他没有服装师，一身蓝布大褂伴他度过生命最后岁月。他没有专门的厨师，饭菜非常简单。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人都兼顾几项工作。为了解市民生活情况，他有时独自一人到公共浴室沐浴，碰上人很多的时候，照例排队等候，自己掏钱买票，一切依照普通人的手续办理。浴毕外出，还向为他服务的浴室工作人员道谢。

林森常在福建买一些重庆市面上没有的但又必须服用的药材，这种事政府有明文规定可代办，但他没去惊动政府，而是托他的一位学生帮忙购买。有一次，因飞机耽误时间，托买的药材烂掉了，他怕学生为难，先去信一封以表安慰。

林森不仅对己严，对同乡、同族照样待之很严。林森30岁时，妻子去世，夫妻情深，誓不再娶，未有后嗣，收其兄之子林京为嗣。林京为人乖巧，办事果断，很得林森喜爱。林京在家娶有一位妻子，有次林京生病，妻子不在身边，妻子的妹妹帮忙照料。两人本有好感，经过一段长时间接触，渐涉爱河。其妻知道后，有心玉成其事，终得美满结局。可林森不知其中缘故，对林京的婚事大为生气，表示不再认这个义子。后来，林京亲自带两位夫人前往重庆拜见林森，讲清了婚姻的前后因果，加上两位夫人娴静庄淑，秀外慧中，林森父子关系才得以恢复。可林京终因艳闻触怒林森，父子关系还是断了，直到林京死去，也只感叹数声未能再见。林森还有个侄儿在浙江任官，特从重庆去函勉之：“俗云公门好行方便，也积德立名根基，既负守一方之责，能不自奋秉公为子孙种福乎？……是以名为贵，德为本，……能知洁己公正，

为民造福，方获此佳誉。”在另一封信中又说：“此时切莫见高思迁，恐不能得，……不若整肃县治，致力新县制， 更能有功。毋嫌官小，时生异冀，居高若低，受伤必重，戒之慎之。”

林森也不轻易向中央或地方荐人，他最喜爱的林京都未举荐过。林京虽在军队任过职，但那时林森已断绝了与林京的往来，是因林京办事利落而提拔的。林森很喜欢的一位学生当时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因他的一同学对林森的为人十分钦佩，想到重庆追随林森办事。这位秘书长为这事专程从曲江赶到重庆，向林森转达了他同学的心意。林森当时很感动，对他的学生说：“我可用的人没有缺了，我不应向各机关荐人，因为中央颁布上级不能荐人到各机关的法令，希望你能转告他，不要来了。”他的学生见先生如此守法，非常感慨：“先生的这种精神让我永世难忘，永作箴言。”

总的看来，林森居高位而不抓权，不植私党，没有“自己人”的小圈子，不分派别，以无为治理天下，令后世之人感叹不已。这一点实在给本来就有纷争的国民党内减少了许多麻烦，间接给蒋介石以很大帮助。他常以精诚团结鼓励同事，尤其是抗战时期更要求大家应以团结为上，他曾说：“人类相与，公则易合，私则易离，易经上同人一卦：‘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野，有公众的意思，宗有派别派系的意思，一野一宗，就有亨与吝的不同，丁此国难，必须大家精诚团结，化私为公，才可消弭内外的忧患。”他还强调说，政府的情绪，要时时刻刻贯注到民众，爱护着民众，民众的情绪，也要时时刻刻贯注到政府，爱护政府。林森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受到各方面的欢迎。

无为并不是完全不管，古语云：有所不为方有所为。属林森职权范围的事他都认真细致地参与。 1938年 3月29 日,他主持参加了国民党在武昌召开的临时全会，在会上力主抗战，确立了长期抗战的目标。经过他的努力，大会顺利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抗战有重要意义。大会同时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并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在国家民族利害得失的重要关节上，林森的态度更加明确，对叛党叛国者的制裁，他始终侃侃而言，正气昭然。当德国使者居间诱和时，他坚持武昌会议上的观点，坚定不移赞同抗战到底的正确主张。不论在武昌还是在重庆，他都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支援抗战的各种活动中，以他的学识、威望和义不容辞的行动影响每位大后方的国人，希望大家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他高声疾呼：中华民族已有5000多年的光荣史，我们祖先传下来的锦绣江山，以及完整的国家主权，都担在我们的肩头，不幸现在遭到了空前的困难，我们每一个人肩膀上的担子更比以往各时代的古人，大上万倍。他昭告每一国民：“每一个人都应为抗战建国尽力，……各竭其能，各尽其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自己把平日宝藏的玉鼎、古炉以及护国宣化广慧圆觉大师西藏班禅额兰德尼所献的宝戒并所作书画多幅，作为献金之倡。据林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那枚宝戒是班禅大师1933年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加持以献他的，素极珍贵，收藏得非常隐秘，常人根本见不到。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汪精卫离渝时，中枢讨论处置办法，林森认为对背叛国家和人民的贼子，绝不能予以优容。当他得知汪精卫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仍使用林森称号时，不顾73岁的高龄，亲到中央电台痛斥汪伪的叛变行为，鼓励公民要有骨气，坚持抗战。林森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履行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林森非常重视教育和利学，这反映出他识见之远，存心之深。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林森一方面关注战争局面的成败，一方面顾虑到敌势日张，只有寄希望于后起人才的培育，以宁可前仆不可无后继的心情，企延国脉于不坠。他深深体味到国家的强弱就在于科学和教育的发达与否。日军的嚣张，使每位国人饱受科学落后的痛苦，林森认为根本的救国之道就是发展科学

而欲求中国科学的发达与昌盛，科学教育非迅速着手不可。他于痛心之余，毅然尽其一生的积蓄50万元国币，立下遗嘱，作为奖励科学人才发展的基金，其用心之苦，不难想见。这一遗嘱是：“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森今年七十有二矣，身后之嘱托不能不预为之计。吾国自然科学人才之消乏，今昔同感，陶冶补充，刻不容缓。兹谨记总理迎头赶上之遗训，将所存国家银行国币五十万元，拨为基金，以其每年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固定经费，并手自订定办法二十四条，嘱由能表同情于斯学者，恪守此方针而办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期共循此旨，知守弗渝，用垂永远，而利国家，有感厚望焉。”立遗嘱时局势很紧张，但在后方仍进行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留学生选拔赛，在重庆，成都都设有选拔点。目前海内外对科学有造诣的一群专家学者当中，受了林森这一提倡科学号召而出国深造的当不在少数。当时许多人都希望民族的创痛不能在后一辈人身上再演，但大都不认为选用青年出国是当务之急，这更显示出林森的远见卓识。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黄季陆1941年专程到重庆请示办学的方针，林森态度坚决地说：发展科学、宏扬学术就能拯救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子孙免受今日惨烈的战争。他认为：把这一次的困难度过之后，如果还有同样的战争，我们仍以血肉相抵抗，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黄季陆说：川大将永久建在四川，学校每位员工勿要因战时而得过且过，不要因战时不积极从事于建设。这些话对每一个办教学的人都是很有影响的。

1943年 5月10日，林森由国府办公完回官邸，途经化龙桥，因车祸引起脑溢血。6月下旬略见好转。7月21日病情加重，8月 1 日晚7 时4 分去世。在他病情暂时缓解时，他已感觉不久人世，便立下遗嘱，对未能见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十分遗憾，希望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同心御侮。林森去世后，国民政府在其墓志铭中总结了他平凡而卓越的一生，铭曰：“中庸之言曰：‘君子

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大学之言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每读斯语，未尝不悠然以思，慨然以兴，念斯人之不易观；今于吾林公子超之逝，乃不禁为之瞻依仰止，永矢弗谖矣。”

陪都时期的冯玉祥

恽 和 平

笼 中 虎

1938年底，冯玉祥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这个依山而筑，两江环绕的山城，成了中国政府指挥抗战的中心，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随着国民政府的迁移，日机像影子一样追踪而至。成千上万吨炸弹从重庆上空倾泄而下，重庆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山城化作一堆废墟。

面对暗淡的时局，冯玉祥开始了他政治生活中最苦闷的时期。

他的苦闷在于他面对大好河山被日寇蹂躏而不能奋起抵抗；他的苦闷在于他坐视江河日下而无能为力。

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位高而无实，闲居而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